

# The Difference That Translation Makes: The Translator's Unconscious

By Lawrence Venuti

Translated by LONG Pengyi

Received: March 21, 2024

Accepted: April 2, 2024

Published: June 30, 2024

**To cite this article:** Lawrence Venuti, trans. LONG Pengyi. (2024). The Difference That Translation Makes: The Translator's Unconscious.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2), 042–061, DOI: 10.53789/j.1653–0465.2024.0402.003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4.0402.003>

**Abstract:** The article engages with William Weaver's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1989) as an interpretative point of departure for the loss that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enforces on the source text which can never entirely be avoided. And translators cannot obviate the gain in their transl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ifferent meanings, structures, figures, and traditions and thereby the creation of textual effects (remainder) that go far beyo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lexicographical equivalence to signify primarily in the terms of the translat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Psycho-analytical concepts will enable distinctions to be drawn between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translator's unconscious, between the translatory and the personal, the cultural and the political. And the gender identity of the source author or the translator may have a bearing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symptomatic textual features that might occur.

**Keywords:** unconscious; remainder; lexicographical equivalence; Psycho-analytical

**Source:** Venuti, Lawrence. 2013. "The Difference That Translation Makes: The Translator's Unconscious." In *Translation Changes Everything: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32–56.

**Notes on the author:** Lawrence Venuti is an American translation theorist, translation historian, and translator from Italian, French, and Catalan.

**Notes on the translator:** LONG Pengyi,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the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t Jishou University, with a research interest in translation teaching and practice, email address 442883646@qq.com.

# 譯製異

## ——論譯者無意識

<sup>1</sup>勞倫斯·韋努蒂/文 <sup>2</sup>龍鵬屹/譯

<sup>1</sup>天普大學;<sup>2</sup>吉首大學

**摘要：**本文以威廉·韋弗《翻譯的過程》為出發點，探討了譯者無法完全避免翻譯過程對源文本、其意義和結構、圖式和傳統所造成的損失。同時也無法避免翻譯過程中的收穫，包括對不同意義、結構、辭彙和傳統的構建，從而創造出遠遠超過詞彙學對等的文本效果——「語言剩餘」。通過精神分析，有助於我們區分譯者無意識的不同方面，如翻譯與個人，文化與政治。同時作者認為原文作者或譯者的性別身份可能對譯文出現的症候性文本特徵的性質和意義產生影響。

**關鍵詞：**無意識；語言剩餘；詞彙學對等；精神分析

**來源：**原文載於《翻譯改變一切：理論與實踐》(Translation Changes Everything: Theory and Practice)

**作者簡介：**勞倫斯·韋努蒂，美國翻譯理論家、翻譯曆史學家，意大利語、法語和加泰羅尼亞語翻譯家。

**譯者簡介：**龍鵬屹，吉首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興趣為翻譯教學與實踐，郵箱：442883646@qq.com。

毋庸贅言，以下的描述存在片面性，甚至可能帶有誤導，因為我試圖使一些東西變得有意識和合乎邏輯，而在大多數時候這些東西都是無意識和本能的。面對「也許」和「或許」之間的選擇，譯者不會對譯文進行審判，也不會聘請律師對自己的翻譯進行辯護。最有可能的是，在翻譯過程中，這些不同譯文在他腦海的某個角落響起，聽起來其中某個選擇比另一個更好。當然，這好像只是個本能的決定。譯者對作品的瞭解和他在那個時期的閱讀決定了他的本能。幾乎可以肯定的是，他的直覺不會受到任何規則的指導，即使是譯者自己制定的規則。

威廉·韋弗《翻譯的過程》(1989)<sup>[1]</sup>

威廉·韋弗(William Weaver)因此撰寫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詳細描述了在翻譯義大利短篇小說某一段落中所做的選擇。到1989年，韋弗已經是公認最好的義大利現代小說的譯者，當時他已經翻譯了大約60部作品，並獲得了美國翻譯家協會和美國筆會中心等文化機構頒發的著名獎項。鑒於他的豐富經驗，我們必須認真對待他的觀點，即翻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不假思索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譯者做選擇的依據不僅沒有被闡明，而且他自己也不知道。因此，這是「無意識的」——譯者在「他頭腦的某個角落」做出了翻譯選擇。儘管在描述這樣的翻譯過程中，韋弗給出了他選擇的理由，但他自始至終也沒有解釋過這些理

[1] 詳見, Weaver, William.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1989.



由,最多不過停留在諸如對一個義大利詞(atti 與其說是 actions,不如說是 deeds)或對一個可能的英語對等詞(highfalutin, too banal, a pompous ring)的簡短語義或文體評論(Weaver 1989:119, 118, 120, 123)。許多選擇要麼基於仍未說明的語言和文化價值觀,要麼基於純粹的個人偏好:「通過選擇 beat 而不是 beating 我就可以避免使用-ing 形式,這篇文章中的-ing 形式可能太多了」;「這篇文章有幾個我討厭的詞」;「從字面上翻譯(一個想法,又一個想法……),我覺得這樣不對」(同上:122, 118, 119)。韋弗的文章記錄了自己的翻譯過程,即便他並未對此做解釋。他還斷言,「大多數時候」翻譯都是「無意識的」,不僅對他,或對他那一代的譯者,也對一般的「譯者」而言均是如此。

這是一個引人深思的假設,卻很少有相關的翻譯研究(值得注意的例外是 Gavronsky 1977 和 Frota 2000 的假設性研究)。翻譯學者研究了譯者在職業生涯中內化的語言和文化資源。這些資源在翻譯過程中被譯者自發性地使用,但在反思時又可以清晰表達出來。可以說,這些資源構成了譯者的潛在思維,它們很容易被恢復而不是被抑制(見 Toury 1995: 53-69 中對「規範」的應用)。然而,儘管韋弗的文章明確提到了這樣的資源,即「對作者作品的瞭解」,「同期的閱讀體驗」,他還是強調了個人偏好或反感,例如「另一個似乎總是給我帶來問題的詞……」;「我不喜歡連續使用兩個複數」(Weaver 1989: 119, 120)。即便如此,他沒有錨定這些偏好或反感的來源。鑒於此,人們或渴望探尋,如此選擇是否帶有無意識的痕跡。韋弗否認在本人翻譯實踐中所應用的「規則」是否同樣是無意識、潛意識的。再者,是否在這一潛意識在他本人的案例中或被抑制,但活躍在其翻譯過程中。

精神分析學者也傾向於忽略這樣的思考。相反,他們認同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觀點,將翻譯理解為一種精神過程,例如,將無意識材料翻譯成症狀,翻譯成夢的外顯內容;或是針對診療過程的闡釋,換言之,將症狀和夢翻譯成分析師的語言(Mahony 1980; Amati Mehler 1990: 297-301)。巴斯(Allan Bass, 1985)對作為語際譯者的弗洛伊德進行了研究,將「語誤」視為其無意識動機的標識。正如研究所表明的那樣,我們需要更多地關注無意識動機這一現象。作為精神分析理論中的一個普遍性範疇,它可能以某種方式在譯者的選擇中起作用,並外顯於譯文,亦可被重構。

本文的目的便是追尋這種思路。我的出發點不是精神分析,也不是對基本精神分析概念的闡述,而是翻譯理論,以及對於在翻譯中出現的基本語言和文化問題的表述。如果譯者的無意識在翻譯過程中起作用,那麼理解翻譯這種獨特的語言和文化實踐如何賦予精神的分析概念以特定形式與意義便顯得尤為重要。這種方法將有助於區分譯者無意識的不同面向,如翻譯與個人、文化與政治。此外,我將闡述翻譯的理論概念,並借助一處具體案例加以闡釋,以便為精神分析手段介入翻譯研究奠定文本基礎。

## 一、翻譯中不可還原的差異

儘管原文和譯文之間似乎有著相似的語言和話語結構,但在翻譯過程開始前並不存在形式和意義上,甚至是接受的相似性。相似性都是建立在不可還原的差異之上,這些差異在翻譯開始之前就已經存在,譯者可能會努力解決這些差異,或乾脆將其進行神秘化處理——就像流暢的翻譯會產生透明度錯覺一樣——但這些差異仍然存在於譯文中,並使其交際功能複雜化(Venuti 2008: 1-5)。這些差異存於語言和文化之間,儘管它們是翻譯中首先要解決的問題,然而翻譯最終會讓這些差異倍增甚至惡化這樣的差異。有時譯

者並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譯文所針對的讀者在多數情況下同樣觸及不了這樣的問題。19 世紀以降,讀者距離原文越來越遠。我們應研究這些差異,即使它們產生於無意識。然而,我們不指望根除它們,它們無法被抹去。事實上,有些差異不應被抹除。對於理解或意識到源文本的異質性來說,這些差異是必要的。換言之,正是這些差異讓譯語和譯語文化構成的譯本異於原文。翻譯研究的目標歸根結底是倫理層面的,即發展翻譯研究和實踐的手段;描述、闡釋翻譯中不可避免的差異;並對這些差異負責。

為了探究這些論斷,我將首先借鑒後結構主義的語言和文本理論,特別是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的研究成果。這些理論力求考慮到語言和文化差異,也正因此,我們能以最精闢和複雜的方式思考這些差異。在德里達關於翻譯的許多富有啟發性的評論中,有一段提到了翻譯文本的物質性:

我們無法翻譯一個詞的物質性或把它帶到另一種語言中。物質性恰恰是翻譯所放棄的。放棄物質性:這就是翻譯的動力。當這種物質性被恢復時,翻譯就變成了詩歌。從這個意義上說,由於符號的物質性構成了每個夢境的習語,所以夢是不可翻譯的(Derrida 1978: 210)。

在德里達看來,原文的主體(*le corps*),即構成源文本的聲學或文字符號的特定鏈條意義上的物質性。它無法在翻譯中重現,因此不可避免地被譯者丟棄。更確切地說,這種置換涉及到雙重損失:一方面是文本內部的損失,也就是那些構成原文獨特質地或表意過程的要素;另一方面是文本間關係的損失,對於廣泛使用源語言閱讀的讀者而言,損失的是原文意義。由於放棄了源文本的物質性,翻譯從根本上是去語境化的:它瓦解了構成原文的語境。這種去語境化是翻譯過程產生的首種差異。

德里達還注意到,若翻譯在另一種語言中恢復了主體,也就是複歸了另一種能指鏈意義上的物質性時,翻譯就是「詩」(*poésie*)。「詩」這個詞顯然可以有各種各樣的含義,這取決於闡釋者如何解釋。我們不能從這段話中確定德里達本人賦予了它什麼含義,但考慮到他是一位精通哲學史的哲學家,我就借用 *ποίησις* (*poiesis*) 一詞的古希臘哲學內涵來理解這個術語:翻譯涉及一種特定的創造或發明行為。翻譯創造了另一個能指鏈,伴隨著文本內的影響和文本間的關係,旨在再現原文。然而,這對譯語與文化也同樣起作用。可以說,翻譯超越了譯者在原文中建立的任何單義符號的交流,無論這一符號是否藉由「還原」或「去語境化」流程獲得。譯者若要尋求一個確定的所指,且這一所指不但要符合原文,而且需滿足受眾的可理解性和興趣,那麼我們可稱,創造不同的能指鏈增加了語義的可能性。在複返物質性,創造文本的過程中,翻譯從本質上經歷了語境重構。這便產生了第二種差異,而這一差異則是一系列「銘刻」在原文中的語言與文化差異。

巴斯對德里達法語文章的英譯中可印證這些觀點。他不僅放棄了法語的能指鏈;他也沒有沿用法語中關於形容詞置於名詞後的慣常句法,例如「*un corps verbal*」或「*l' énergie essentielle*」,也未採用最後一句開頭的奪格結構:「*le corps du signifiant constituant l' idiome……*」。巴斯沒有恢復德里達作品的這些物質特徵,因為法語和英語根據不同的語言和話語結構表示不同的意思。將形容詞放在名詞後面是當代法語的標準用法,但這在英語中卻是古老的用法,今天僅限於在某些文學語境下使用。巴斯顛倒法語形容詞的順序時,他遵循了現行的標準英語用法。奪格結構反映了菲利普·劉易斯(Philip Lewis)所稱「法語中普遍存在的更鬆散、更不確定的關係」;而英語傾向於「嚴格、精確以及同質的關係」(Lewis 1985: 35)。在譯本中,巴斯遵



循了英語對精確和連貫的偏好，規避了鬆散的奪格形式，創造了關係從句，並插入了連接詞「since」。

巴斯的辭彙選擇也可照見同樣的語用偏好。然而，相較於德裏達的原文，巴斯的選擇存在更顯著的偏差：法語原本用「corps(主體)」等詞指代語言，借「laisser tombe(墜落,下降)」等詞來指代翻譯強加給原文的損失，既具體又隱喻，但英語的「materiality(物質性)」和「relinquish(放棄)」則分別更為抽象和精確。巴斯不僅根據英語特有的用法偏好重塑了德裏達的法語，他還將其文體從文學轉向了哲學。按照英美哲學中由來已久的一般區分，他將法語文本中的語言同化為了英語哲學傳統中的慣常語言。至少，自19世紀末以來，歐洲大陸哲學傾向於模糊文學和哲學寫作間的界限：人們不僅要考慮後結構主義，還要考慮存在主義現象學；不僅要考慮德裏達，還要考慮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和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相比之下，英美哲學旨在藉由科學寫作的模式，技術術語來維繫「文—哲」之別：看看符號邏輯和言語行為理論，也別忘了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和約翰·奧斯汀(John Austin)。這種差異亦可在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著作中發現。這樣的差異或許源於他的雙語環境：他祖籍奧地利，慣用德語寫作，但又長期旅居在英國。維特根斯坦也從早期《邏輯哲學論》(1922)的嚴謹邏輯風格轉變到了後期《哲學研究》(1953)的對話形式，且偶現比喻的風格<sup>[1]</sup>。

巴斯的翻譯揭示了譯文的特殊物質性，以及譯者在翻譯文本時的意圖。他所堅持的規範影響了今天大多數譯本。不論涉及何種語言和文化，人們普遍認為，一個可接受的翻譯包含了與原文大致相同的字數或頁數。儘管語言間存有差異，當代譯者在翻譯中經常偏離原文的句法結構和辭彙項，但他們仍試圖在現行詞典的基礎上保持語義相似性，或換句話說，維持詞彙學上的對等特徵。正如德裏達在別處所論證的，這種意圖是「盡可能接近「一個詞接一個詞」的對等。以詞的數量為標準，尊重語言在「量」上的對等。每個詞都是一個不可還原的主體，代表一種聲學形式上不可分割的統一體，包含或象徵著一個意義或概念層面不可分割的統一體」(Derrida 2001: 181)。因此，努力保持辭彙對等是基於語言中特定的意義概念而言的。然而，原本的物質性，甚至翻譯行為本身都不斷受到質疑，因為翻譯取代了構成原文的符號，並擴大了與接受者的語言以及文化的差異。在德裏達使用的法語單詞「corps」和巴斯選擇的英語單詞「materiality」之間可以找到詞彙學上的對等——但只有當這兩個單詞被簡化為一個共同的意思時，剔除了各種變體、形式和語義上的差異，這種對等方能實現。這些差異使它們既能在法語和英語中表示更多的可能性，又能將它們出現的文本與不同的哲學傳統緊密聯繫起來。

## 二、語言剩餘與譯者無意識

基於上述論點，譯者永遠無法全然避免翻譯過程對源文本、其意義和結構、圖式和傳統所造成的損失。同時，譯者也無法避免翻譯過程中的收穫，包括對不同意義、結構、辭彙和傳統的重構，從而創造出遠超詞彙學層面對等的文本效果<sup>[2]</sup>。按讓-雅克·勒賽克爾(Jean-Jacques Lecercle, 1990)在其重要著作中所表達的觀點，我稱這些效果為翻譯中的「語言剩餘」。如勒賽克爾的理論而言，語言剩餘始終存在於語言使用中：它

[1] Perlo Saffillies 在 1996 年論及了這一轉變。

[2] 這些效果主要是就譯語語言和文化而言。

包括當前標準方言的一系列可能的語音、辭彙和句法變體。人們通過定義將文化和社會價值賦予標準方言，從而排除或抑制其他的非標準形式，或將非標準形式的使用限制在特定的用途和場合。標準方言將語言使用者推向同質性，例如要求使用者遵守語法規則和使用符合普遍規範的意指，而語言剩餘則將人們的注意力引向了語言的完全異質性。語言剩餘包括各種變體，諸如地域方言和社會方言、口號和陳詞濫調、專業術語和俚語、古語和新詞、比喻和雙關語等文學辭彙、創新的文體和外來詞。在改變標準方言的過程中，語言剩餘引起了人們對一切交流行為中語言、文化和社會條件的關注。通過這種方式，人們明白了標準方言僅僅是多種可能形式之一，進而讓單義符號的交流變得複雜。語言剩餘不是從標準方言或從該方言中交流的意義中遺留下來的東西，而是組成一種「標準」或者和任何「交流」意義的要素，即便它受到排斥或限制。

在翻譯中，語言剩餘包括語言形式和文本效果，它們同時改變了譯語的現行標準方言以及原本的形式和語義維度。這些變體構成了語言剩餘，讓建立與源文本的詞彙學對等變得複雜。原因在於，它們只在譯語語言和文化維度中起作用，並反映出了接受者的語言、文化和社會條件。語言剩餘是歸化過程中最明顯的標誌，歸化總是在翻譯中起作用——它始終將原文同化為接受文化中讀者可以理解 and 感興趣的內容。語言剩餘也可能同樣是異化效果的一個重點，因為它偏離了現行的標準方言，而標準方言是讀者最熟悉，也是編輯最常強加給譯者的譯語語言形式。巴斯對德裏達法語原作的英譯可以說釋放了一種獨特的哲學語言剩餘，通過這種語言剩餘，他對英語辭彙的選擇使法語與英美哲學傳統同化。最終，巴斯的選擇與其說是歸化，不如說是異化，因為這些選擇在傳統與德裏達哲學間建立了語言相似性，這些相似性最終使他的思想明顯與眾不同。

語言剩餘可以由語言使用者有意製造出來。例如，一位詩人或小說家，可能希望為了實現文學效果而改變當前的標準方言；科學家或工程師可能希望發展出專門的術語來更精確地描述科學定律或技術過程。同樣，譯者也可能決定製造語言剩餘，以改變原文的形式和意義，因為原文的語言特徵或文學效果在翻譯中只能是以近似的方式被重現，而不能在原文的相同位置精確再現。這種有意的變化有時被稱為補償，即創造一種特徵或影響，以補償因語言和文化差異而導致的源文本某些方面的損失（見 Harvey 1995）。

語言剩餘也可能被無意地製造出來。會話和寫作可以產生出標準方言的變體，這些變體不受語言使用者意識的控制，但仍然表達對話者和讀者所理解的含義。事實上，勒賽克爾認為，語言剩餘可以被認為是「弗洛伊德無意識的語言等價物，被語法的規則排除或壓抑，但試圖通過笑話、口誤、語法錯誤和詩歌回歸」（Lecerle 1990: 23）。同樣，在翻譯中，語言剩餘對譯者來說可能意識不到，但對原文和譯語文化而言卻非常重要。例如，譯者可能無意中誤解了原文的辭彙或句法結構，這種錯誤可能會產生一個重大後果——壓抑了原文的意義闡釋。

現在，我們來解讀一下巴斯的一處誤譯，他誤解了法語句法。原文的第四句，德裏達寫道，「quand elle réinstitue un corps, elle est poesie」，如果用貼切的英文來譯，可能是，「當它（翻譯）重新建立一個主體時，它（翻譯）就是詩歌。」這個重複出現的陰性代詞「elle」，我認為是指陰性名詞 la traduction（翻譯）；在 corps 前的不定冠詞 un 指的是譯語中的任何言語主體或物質性，即譯者為翻譯原文而可能設計的該語言中的任何能指鏈。巴斯的譯本與法語原文存在幾處不同。其中兩個，即詞序的顛倒和動詞從主動語態到被動語態的改變，並非不正確的翻譯，因為它們並未改變文義。我說的誤解指的是用指示詞 that 替換不定冠詞 un，而 that 顯然是指文章前三句中提到的原文的物質性。從「un」到「that」的轉變是錯誤的，因為它顛倒了意思。德裏

達英文譯本中的第一句說原文的物質性不能延續,這與第四句說這種物質性實際上可以延續或「複返」相矛盾。顯然,二十多年來,沒有讀者察覺到這段話中有任何錯誤,因為他們認為「that」指的是譯文。然而,這樣的解讀忽視了這個指示詞的指示力——它指的是前三次所提及的「物質性」。

我們該如何解釋這個錯誤呢?重要的是,這個錯誤肯定不是出於譯者的翻譯能力。巴斯是一位知識淵博的德裏達譯者,他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獲得了法國文學博士學位,然後在紐約接受了精神分析師的培訓,並繼續在那裏執業。他翻譯了德裏達的四本書:《寫作與差異》(*Writing and Difference*) (1978),本文就是從這篇文章中摘錄的;《立場》(*Positions*) (1981);《哲學的邊緣》(*Margins of Philosophy*) (1982);《明信片:從蘇格拉底到弗洛伊德及以後》(*The Post Card: From Socrates to Freud and Beyond*) (1987)。巴斯的翻譯總有富有啟發性的譯注。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對德裏達的哲學和精神分析進行了精闢的評論。更重要的是,巴斯是一個一絲不苟的譯者,他經常參考以前出版的譯本。就我們正在討論的這篇文章而言,他研究了傑弗裏·梅爾曼(Jeffrey Mehlman)先前發表的譯本,梅爾曼是波士頓大學的法語教授、同時也是包括精神分析理論在內的法語理論著作的譯者(Derrida 1978: xx)。然而,梅爾曼的譯本中有著完全相同的錯誤和句法誤解,甚至連措辭都一模一樣(Derrida 1972: 90-91)。

巴斯的誤譯,以及此前梅爾曼的錯誤,可能會認為是校對中的疏忽。無論是譯者本人還是出版該書的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的校對員都沒有發現。但我想說,即使我們認為這個錯誤是個疏忽,它還牽涉到更多問題。這個「更多」就是語言剩餘。它顯然是無意識的,且意義重大。巴斯和梅爾曼的誤譯揭示了所謂「譯者之夢」:翻譯將恢復原文的整體性,在物質性不增不減的基礎上,翻譯將建立與原文的相似性,以克服語言和文化之間不可還原的差異。翻譯本身便是夢境。在這個夢境中,譯者的無意識可以通過語言和話語結構的變化,借助語言剩餘表現出來。譯者創造的能指鏈並不翻譯原文中體現的任何夢境,而是譯者用自己的無意識欲望來代替了它,這種欲望是對特定意義的渴望,或者在本案例中,是對翻譯的特定理論的渴望。然而,這種欲望是隱性的,而不是顯性的,只有通過對句法的錯誤理解才能察覺到。

我將譯者的誤譯作為一種由無意識驅動的符號進行症候閱讀。在此過程中,我借鑒了弗洛伊德對言語失誤和誤讀等常見現象的精神分析路徑(Frota 2000 提出了類似的方法)。巴斯的誤譯實際上是對法文文本的誤讀。

在大量的(誤讀)中,是讀者預先的準備改變了文本,因此讀者從中讀出了所期待或關注的東西。文本本身對誤讀的唯一貢獻就是在語言意象中產生了某種相似性,而讀者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改變這種相似性(Freud 1960: 112-13)。

因此,在翻譯德裏達針對翻譯的一段話時,巴斯改變了句法,創造了一個類似的結構,卻傳達出了一種不同的意義,這種意義實際上與德裏達本人的觀點是對立的。這種對立對於精神分析對誤讀的理解是至關重要的。正如弗洛伊德所說,文本「包含一些引起讀者抗辯的東西——一些令譯者苦惱的資訊或指責——因此這些資訊通過被誤讀來糾正,從而達到否定或滿足譯者願望的目的」(同上:114)。一篇文章對翻譯的可能性提出質疑,斷言在翻譯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有不可挽回的損失,這很可能會讓譯者感到不安。所以,我認為巴斯的錯誤在於假定原文的物質性是可以恢復的,從而否認了翻譯中存在任何損失。梅爾曼譯本中



的錯誤同樣如此。

巴斯的翻譯更精確地描述了譯者的無意識。值得闡明的第一點是，譯者無意識是文本性的：它不存在於譯語之外，而是在翻譯過程中使用該語言時產生的。正如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所言，「無意識既不是原始的，也不是本能的；它所瞭解的基本要素不過是符號的要素」(Lacan 1977: 170)。在製作能指鏈以呈現原文的過程中，譯者會釋放出語言剩餘，暴露出無意識的運作——但僅限於與該文本或其中特定段落相關的部分。這種語言剩餘可能包括各種文本間的聯繫。因此，巴斯證明了弗洛伊德無意而為的誤譯原因是，「它與相關理論太吻合了」，弗洛伊德當時在文章和信件中討論了這些理論，卡爾·榮格(Carl Jung)等同行也在各自的研究中提到了這些理論(Bass 1985: 137)。

此外，拉康認為，主體欲望的匱乏生於能指鏈(Lacan 1977: 256-65)。欲望並非源於主體，而是源於拉康所說的「他者」，即主體在語言習得過程中內化的符號，包括第一個渴望主體的人(即母親)使用的符號；也包括主體期望滿足需求所得回應的符號(同上:263)。「他者」是符號秩序，即通過識別過程構成主體的能指鏈。語言中的這種構成是在主體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發生的。用拉康的話說，「無意識是他者的話語」；或者換句話說，「在他者身上的符號存在。實際上，這是一種對主體封閉的存在，因為它處於持續壓抑的狀態」(同上:193,200)。

就譯者而言，原文的符號是產生欲望的舞臺。原文在譯者的心中造成了缺失，譯者無意識地要求原文滿足這一缺失，並對原文進行了改動以獲得滿足。因此，譯者的欲望主要體現在譯文語言錯位或譯文偏離原文的誤譯情況中。這也意味著譯者的欲望從未真正實現其目的，也從未得到滿足。翻譯中的錯位和對原文的偏離構成了譯者的「幻想」，拉康將其定義為「主體在其消失的欲望層面上維持自己的幻想，只要需求的客體得以滿足，這一客體便隱匿不見，主體就會消失」(同上:272；見 Easthope 1999b 關於弗洛伊德和拉康在觀點上的理論差異)。

因此，德裏達的法文原文經由巴斯的翻譯激發出了一種無意識的需求，即希望原文是完全可譯的。事實上，這種願望在文本主題層面被德裏達的不可譯性斷言所否定，即言語主體不能被延續。這種否定進一步體現在翻譯的辭彙和句法層面，體現在巴斯對英美哲學術語的使用上，並體現在他誤認為「可譯性」可能的渴望上。無意識釋放的語言剩餘是一個幻想，它似乎滿足了巴斯的欲望，卻又掩蓋了譯者實際的沮喪。

雖然精神分析理論旨在研究個體心理，但我將這一理論應用於翻譯時發現，譯者的欲望並不完全是個人的，而是個體間的。原因在於，它受到翻譯理論和實踐的影響，可能會被許多不同的譯者所共有。因此，在兩個不同譯者(梅爾曼和巴斯)不同時刻所完成的譯文中暴露了幾近相同的誤譯，表達了同樣的欲望，即一種對可譯性的無意識欲望。當然，譯文可以表達譯者的個人欲望，因為這些欲望與特定的原文和文化以及這些文本中的特定內容有關。由於拉康理論中的欲望源於他者，而他者承擔了一種象徵功能，代表主體經驗中的各種人，通過認同、移情或替代(例如，成年女性在男性的情感中替代了母親)來發揮作用。我們必須承認，譯者的欲望很可能是由文化傳統和社會制度決定的集體形式(這一觀點暗暗質疑了 Frota 2000 強調的譯者個性)。在此情況下，譯者的欲望可能不僅是個人的，也可能是政治的。



### 三、意外的音效與政治無意識

除了誤讀外,弗洛伊德還認為口誤涉及聲音的相似性。一個本應出現在語篇某一特定位置的詞或短語,被其他聽起來相似但不屬於上下文的詞或短語所取代或污染,最終暴露出一種被壓抑的焦慮或願望。弗洛伊德認為,「不是「聲音的接觸效果」的影響,而是意欲言語之外的思想決定了錯誤的發生,並為錯誤提供了充分的解釋」(Freud 1960: 80)。這種失誤對翻譯有著直接的影響;因為翻譯過程用另一個能指鏈代替了構成原文的能指鏈,所以翻譯可能會產生意想不到的音效。這些音效只在譯語和譯語文化中才起作用,通過同音異義詞或同形異義詞,押韻或回聲建立了文本間的聯繫,從而得以窺見譯者的無意識。

唐納德·D·沃爾什(Donald D. Walsh)1972年出版了聶魯達(Pablo Neruda)《在你身上,大地》的英譯本「In You The Earth」:

Little  
 rose,  
 roselet,  
 at times,  
 tiny and naked,  
 it seems  
 as though you would fit  
 in one of my hands,  
 as though I'll clasp you like this  
 and carry you to my mouth,  
 but  
 suddenly  
 my feet touch your feet and my mouth your lips:  
 you have grown,  
 your shoulders rise like two hills,  
 your breasts wander over my breast,  
 my arm scarcely manages to encircle the thin  
 new-moon line of your waist:  
 in love you have loosened yourself like sea water:  
 I can scarcely measure the sky's most spacious eyes  
 and I lean down to your mouth to kiss the earth.

小玫瑰,小玫瑰

有時，  
渺小而赤裸  
仿佛，  
在我手中，  
仿佛我會像這樣緊抱著你，  
把你含在嘴裏  
但是，  
突然，  
我的腳碰到了你的腳，我的嘴碰到了你的唇。  
你長大了，  
你的肩膀像兩座小山一樣高聳、  
你的乳房在我的胸前徘徊、  
我的手臂幾乎無法環繞你新月般的細腰  
你腰間的新月線：  
在愛情中，你像海水一樣鬆弛下來：  
我幾乎無法丈量天空最寬闊的眼睛  
我俯身在你嘴邊親吻大地。

沃爾什的譯本清楚地表明了他打算實施的翻譯策略。大多數情況下，他選擇緊扣西班牙語原文，尊重聶魯達的用詞、句法和行文。他還堅持使用現行的英語標準方言。然而，這裏仍有兩處例外，這或有助於提高他譯語在英語世界的同質性：人們可能認為「roselet」帶有一種略顯陳舊的詩意，以及縮寫詞「I II」也是一種口語形式。沃爾什譯本與西班牙語如此接近，他的英譯本讓英語讀者又如此熟悉。從這裏可以看出，他明顯要避免他作為譯者的決定性幹預。這正如詩人兼翻譯家本·貝利特 (Ben Belitt) 在一篇評論中說的那樣，沃爾什「扮演了一個「無名小卒」的角色」(Belitt 1978: 48)。沃爾什本人在介紹聶魯達的作品集《地球上的住所》(*Residence on Earth*)時也闡述了自己的翻譯目標：

譯者的雙重責任是找出作者語言所表達的含義，然後在兩種語言間差異允許的範圍內，盡可能忠實於作者的話語和意圖，再用譯者自己的語言來表達。簡而言之，他必須讓語言的帷幕盡可能透明，讓作者用一種新的語言為自己說話 (Neruda 1973a: vii)。

從本文延續的論證邏輯來看，沃爾什對其意圖的陳述非常值得懷疑。他承認語言上的差異使翻譯過程變得複雜，但他似乎沒有意識到，這些差異使譯者製造的任何語言透明度都帶有了一種虛幻的效果，同時也讓聶魯達在翻譯中永遠無法「為自己說話」。沃爾什也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做法與其本人的意圖相悖。例如，他使用了詩歌古語「roselet」，卻沒有再現聶魯達開篇「peque ñ a/rosa, /rosa peque ñ a」一句的意蘊。後者通過西班牙形容詞的靈活定位創造了一種簡單、重複、類似歌曲的效果。在這裏，聶魯達的簡潔被沃爾什詩意



的藝術所取代。因其古樸的風格,沃爾什的詩意因該詞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反而讓這行詩在英語讀者的眼中不那麼透明。

在沃爾什譯本的倒數第二行——「天空最寬敞的眼睛」出現了與西班牙原文的另一偏差。對於西語的「extenso」一詞來說,選擇「spacious」對譯,不僅不同尋常(將其譯作「wide」或「vast」或更為貼切),而且對於美國讀者來說,這一詞句也會製造出一種聲學上的語言剩餘。譯者或是在呼應凱瑟琳·李·貝茨(Katharine Lee Bates)《美麗的美國》(*America the Beautiful*) (1893-1913)的開場白。這是一首人們非常熟悉的類似國歌的詩,有時還會在公共活動中傳唱:

O beautiful for spacious skies,  
For amber waves of grain,  
For purple mountain majesties  
Above the fruited plain!  
America! America!  
God shed his grace on thee  
And crown thy good with brotherhood  
From sea to shining sea!

啊,寬廣的天空多麼美麗  
因為琥珀色的穀浪  
紫色的高山  
在果實累累的平原之上!  
美國!美國!  
上帝賜予你恩典  
為你的美好加冕  
從海洋到光輝的海洋!

為了檢驗是否沃爾什譯本中存在這種呼應,我將這兩份文本拿給一些有成就的西班牙語詩歌翻譯家比較閱讀,包括墨西哥詩人奧克塔維奧·帕斯(Octavio Paz)的美國譯者艾略特·溫伯格(Eliot Weinberger)。溫伯格表示同意,並補充了一些有啟發性的意見:

誰都說不准,但我猜「為了廣闊的天空」不是有意為之的翻譯——而是卡在他腦子裏的眾多想法之一,然後這個想法蹦了出來。當然,「寬敞」並不是翻譯「mas extenso」的常見方式。但你說得沒錯,skies和spacious的組合會讓人情不自禁地聯想到「oh beautiful。」我經常在我的翻譯中發現有類似歌詞的表述,於是我不得不改掉它——即使它是最直白的翻譯(電郵通信,2000年10月9日)。



溫伯格承認,在他自己的翻譯中也出現過類似的意外。這應該使我們警惕,不要僅僅將沃爾什的譯本視為不充分或不合格。沃爾什(1903—1980)是一位傑出的美國教育家,除了翻譯工作外,他還專門從事西班牙語教學。他曾擔任貴族學校喬特學校(Choate School)的西班牙語系主任。他還指導過美國現代語言協會(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的外語專案,並編輯過美國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教師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Teachers of Spanish and Portuguese)的雜誌 *Hispania*。20 世紀 40 年代,他開始出版各類書籍:兩本西班牙語教師手冊,三本西班牙語教科書,也為學生出版了八本西班牙語的文學課本,翻譯了八部拉丁美洲文學作品,其中包括詩歌和散文,作者包括埃內斯托·卡德納爾(Ernesto Cardenal)、安吉爾·岡薩雷斯(Angel Gonzalez)、佩德羅·米爾(Pedro Mir)以及聶魯達。儘管沃爾什的專業成就頗豐,但他並未深入文學及理論,這影響了他的翻譯實踐。無論我們將他的譯作放在翻譯研究的最新趨勢中進行批評,還是接受像貝利特等同時代作家的判斷<sup>[1]</sup>,沃爾什無疑沒有意識到其翻譯所釋放的語言剩餘,即他的倒數第二行和「美麗的美國」開篇的音效相似。

按照弗洛伊德對口誤的研究,我想說,這種呼應是譯者無意識欲望的表徵。儘管在這裏,這種欲望帶有更大的政治含義。聶魯達的《在你身上,大地》是一首愛情詩。在這首詩中,一位陷入愛河的詩人通過將其所愛的女人比作大地,表達了對她的感性描述。這種類比常出現在各類詩歌中。例如,十七世紀的英國詩人約翰·多恩(John Donne)就喜歡用比喻的方式來形容愛情,戀人成了彼此的整個世界。沃爾什的譯本當然保留了這種比喻,但聲學上的語言剩餘改變了它的意義:情人俯身親吻的不僅僅是大地,或他所愛的與大地類似的女人,而是美麗的美國,一個在貝茨(Herbert Ernest Bates)詩中經某種程度擬人化的國家。在沃爾什的譯本中,人們不自覺地希望,這位站在左翼陣營,借助戲劇《華金·穆列塔之輝煌與死亡》(*Splendor and Death of Joaquín Murieta*, 1966)以及其他作品對美國資本主義進行抨擊而著稱的智利大詩人,也能通過對美國民族主義的鏡映來表達他對美國的看法。

因此,聲學上的語言剩餘揭示了譯者的政治無意識,通過更多的歷史細節,我們會對此更為明晰。總部位於紐約的新方向出版社曾與沃爾什簽約,請他翻譯聶魯達的兩本書,一本是《船長的詩句》(*The Captain's Verses*),其中包含詩歌《在你身上,大地》,另一本是《地球上的住所》。沃爾什於 1971 年交付了首本書的完整手稿(與 Declan Spring 的電郵通信,2001 年 2 月 16 日)。這意味著他在翻譯這些作品時,正值聶魯達獲得諾貝爾文學獎(1971),以及詩人的好友、社會主義政治家薩爾瓦多·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選為智利總統(1970—73)的那幾年。聶魯達本人曾被提名為智利共產黨的總統候選人(1970),但他後來退出了選舉,因為他認為阿連德作為候選人更有可能成功當選(Sigmund 1977: 84–85, 91)。

阿連德當選震驚了西方民主國家,尤其是美國。這不僅引發了政治上的恐懼——共產主義在拉丁美洲的傳播——同時也引發了經濟上的恐懼——外國利益在智利的終結。當阿連德迅速採取行動,重組智利經濟,實行土地改革,並將一些由美國公司擁有的產業收歸國有時,人們的擔憂似乎變成了現實。時任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森(Richard Nixon)的反應是對智利實施國際經濟制裁。聶魯達最終發表一篇文章,呼籲刺殺尼克森,同時也讚揚了智利的社會主義「革命」(Neruda, 1973b)。

[1] 即「簡單的語義學和錯誤的科學類比導致他用詩歌的‘詞語’以及詩歌的‘意圖’與詩歌的‘數據’去考量詩歌的真實性」(Belitt 1978:46)。





沃爾什譯本中的聲學語言剩餘可以說是對令人不安的政治現實——智利和美國對立——的一種主觀處理。正是他所翻譯的詩人介入了這場對立，因此他的譯本體現了文學文本中的政治無意識，即通過構成意識形態解決方案的形式和主題特徵，為真實的社會衝突提供想像補償的能力（關於這一概念，見 Jameson, 1981 第一章）。沃爾什的意識形態解決方案顯然是保守的，他希望像聶魯達這樣的左派詩人不僅接受，而且珍惜美國的霸權地位。

沃爾什的翻譯實際上反映了冷戰時期美國自由民主和蘇聯國家社會主義之間緊張的意識形態衝突。作為美國現代語言協會的管理者，他與人共同撰寫了一份關於外語教育的報告（Starr et al. 1960）。該報告認為，外語學習是避免以種族中心主義看待外國文化的重要手段。「學習一門外語，」作者斷言，「可以讓學生置身於語言所表達的文化之中，並使他擺脫其所在社區以種族為中心的態度，擺脫他要成為一個負責任的世界公民所必須克服的偏見」（同上：20）。然而，在當前的地緣政治形勢下，成為「負責任的世界公民」就要為美國的利益服務。沃爾什在他署名的序言中明確地將該報告與 1958 年的《國防教育法》（*the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聯繫起來，提到「專業人士和公眾意識到，讓更多的美國人熟練掌握多種外語符合國家利益」（同上：9；關於國會法案的政治意義見 Clowse 1981）。20 世紀 50 年代，在為現代語言協會的外語專案工作期間，沃爾什還幫助起草了幾份政策聲明，其中將「美國現在佔據著世界領導地位」的觀點視為「普遍現象」，從而證明加強外語學習的合理性（同上：83）。

這種政治保守主義只能在阿連德總統尚存爭議的任期內才能得到體現。在沃爾什的譯本中，這種政治保守主義的壓力被激發出來，聲學的語言剩餘成為一種無意識的意識形態路徑。事實上，該譯本通過與西班牙文本的微妙偏差將這一手段推向了高潮，這種偏差在沃爾什故意貼近文本的翻譯中尤為明顯。聶魯達在詩的開頭使用現在時態的動詞來喚起情人與女人的柔和親密關係，而沃爾什則依賴虛擬語氣和將來時態，暗示——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是自相矛盾的——親密關係尚未實現。因此

parece  
que en una mano mia  
cables,  
que así voy a cerrarte  
y llevarte a mi boca,

可能會被譯為

it seems  
that you fit  
in one of my hands,  
that I am going to clasp you like this  
and lift you to my mouths

看來  
你似乎  
在我手中  
我要像這樣抱住你  
將你送入我的口中

沃爾什則將其譯為

it seems  
as though you would fit  
in one of my hands,  
as though I'll clasp you like this  
and carry you to my mouth,

似乎  
仿佛  
你在我手中  
仿佛我會像這樣緊緊抓住你  
把你送到我的嘴邊

特別是在重複的「仿佛(as though)」中,情人似乎只是在幻想他與女人的身體接觸。沃爾什的翻譯比西班牙語原本更循序漸進地揭示了這種接觸,在與美國國歌產生共鳴的句子中強調了親吻。我認為,這種強調體現了譯者無意識層面,用保守的意識形態解決智利危機的強烈渴望。

沃爾什的譯文再次表明,源文本通過文本效應(這裏是通過破壞聲音)創造了無意識舞臺,從而製造出了譯者的欲望。這一案例也指出了廣泛的互文網路在欲望產生中的作用:沃爾什翻譯的互文性不僅包括《美麗的美國》,還包括聶魯達的其他文本,以及印刷和電子媒體對阿連德總統任期的驚人報道。沃爾什聲稱他的翻譯嚴格按照西班牙文本進行,但他當時處在動盪的文化和社會環境,這一動盪削弱了他對此種翻譯策略的主觀把控。

#### 四、產生虛假同源詞的無意識動機

假同源詞代表了翻譯中有時會出現的另一種言語失誤或誤讀。從譯者的經驗以及要翻譯的原本來看,這些失誤可能透露出一種無意識的願望。譯語中的假同源詞常因詞源相同,在形式上與源語某詞非常相似,但由於兩種語言經歷了不同的歷史發展,所以含義大相逕庭(見 Shuttleworth & Cowie 1997: 57-58)。這種相似性往往非常顯著,所以初學翻譯的譯者常常基於詞音或正字法,選擇錯誤的同源詞。他們常常並不

那麼瞭解源語,翻譯經驗也相當有限。假設,我們在已有相當數量譯作的譯者在其譯本中找到錯誤的同源詞,且我們不能簡單地將其歸因於譯者語言知識不完備或有限的翻譯經驗,或弗洛伊德所稱「(個體)相似、懶惰或匆忙的規律」(Freud 1960:221)時,那就應該為這種錯誤尋找一個無意識的動機。此外,在此情景中,將錯誤的同源詞與原本意義作為整體來考察或會很有啟發。原因在於,這個錯誤可能是譯者對該文本的隱性評論。

舉一個我本人義大利語翻譯的案例。1983年,我出版了自己的第四部長篇譯著,一部二十世紀作家迪諾·布紮蒂(Dino Buzzati)的短篇小說選。在一篇名為「妖怪」(*Il Babau*)的故事中,一名在市議會任職的工程師強烈反對一名保姆用「愚蠢的迷信(stolte superstizioni)」來管教他的兒子,即這個故事的同名主人公(Buzzati 1983:118)。最終,工程師說服了議員,下令處死這個想像中的生物。行刑後,故事以敘述者對任何仍然存在的幻想發出警告而結束:

Hurry, fly away, superstitious fantasies. The civil world, eager to exterminate you, follows in hot pursuit. It will never let you rest (Buzzati 1983: 122).

快逃吧,迷信的幻想。民間世界,渴望消滅你,對你緊追不捨。永不讓你安息。

在此譯例中,我用了一個錯誤的同源詞:我用「superstitious」來翻譯義大利語「superstite」,而它的實際意思是「倖存」。我當時完全沒有意識到這個錯誤,出版商的校對也沒注意到,後來一位評論家指出了這個錯誤。他認為:

在布紮蒂口中的臨床和實證主義時代,這些幻想以某種方式得以存有,它們鬼鬼祟祟,超然物外。迷信的是我們自己,我們相信自己更為真實(Cary 1983: 120)。

實際上,我的錯誤顛倒了故事的意思:布紮蒂旨在質疑工程師「妖怪是愚蠢迷信」的指控,而我的譯文卻認同了這一指控。

在翻譯進行過程中,我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翻譯經驗,而且在我的這個譯本或以前的譯本中也沒有發現其他錯誤的同源詞。所以,我想說,這個語言錯誤是無意識動機製造的語言剩餘,構成了對布紮蒂故事的批判性評論。它傳達了我被壓抑的判斷,即他對妖怪的處理應該被視為迷信,因為他所表現的超自然或神奇的心理過程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事實上,布紮蒂對妖怪的描述並不一致:一方面,這個想像中的存在被稱為「滑稽的朋友/敵人」,並被描述為「一種巨大的黑色動物,其形狀似乎是河馬和獾的雜交品種」(Buzzati 1983: 122, 118);另一方面,它的功能與弗洛伊德理論中痛苦的懲罰夢類似:在夢中,做夢者實現了一個願望,即「因被壓抑或被禁止的衝動而受到懲罰」(Freud 1953: 710; 另見 613, 708-713)。因此,人們會認為「妖怪」會「引起」遭責備孩子的「惶恐,甚至恐懼」,他也引起「工程師片刻的焦慮」。他以上司的面孔出現,而上司對他的職業抱負以及他在公司的「顯赫地位」構成了威脅(Buzzati 1983: 118-119)。Buzzati 對妖怪的描述結合了弗洛伊德關於夢的心理決定因素,以及外部因素對人類思想和行動的迷之影響(Freud 本人在

其文章中對此作了這一區分:1960: 256-260)。我使用假同源詞便體現出了這般不一致,並否決了它。

在這種情況下,由假同源詞釋放的語言剩餘在譯本持續回蕩,譯語的含義最終被證實是自相矛盾的。在將義大利語單詞「fantasia(幻想)」翻譯為「fantasies」時,我的英譯涵括了另一種語義轉變。這一轉變不僅是從單數到複數,而是從一般到特殊;該詞從屬於心智能力的「fantasy(幻想)」或「imagination(想像)」到特定的「fantasies」。該術語可適用於故事中的每一種夢幻表現,無論是想像中的妖怪,還是孩子們和工程師本人經歷的懲罰夢。因此,「superstitious fantasies(迷信的幻想)」這一誤譯相當於徹底否定了布紮蒂故事中可感知的弗洛伊德概念。這是我對夢的否定,甚至是對無意識存在的否定。這也一併否認了它可能影響的任何人類思想或行為,包括譯者的作品。這一誤譯彰顯的是,作為譯者的我與那位工程師一樣,都是以壓抑的理性主義來質疑布紮蒂對幻想的哀悼。我對這位義大利作家的無意識描述做出了回應,就像接受精神分析的來訪者常對精神分析做出阻抗回應一樣。在這裏,我選擇了一個誤譯能指,壓抑了義大利文本中的一個關鍵能指,同時通過本人誤譯造成的矛盾揭露了本人的壓抑。

我對我自己誤譯的解讀怎麼會既認為精神分析概念具有相關性,又否定這些概念呢?弗洛伊德的理論實際上解釋了這一矛盾。他首先觀察到,在言語失誤和誤讀等現象中,被壓抑的焦慮和願望的顯現與「夢形成的機制」相對應:在這兩種現象中,「通過陌生的路徑,以及外部聯想,無意識的想法作為「其他想法」的變體得以表達」(Freud 1960: 277-278)。其次,弗洛伊德對夢的研究表明,無意識缺乏任何否定或調和邏輯對立面的形式和過程。相反,它完全是通過並置來工作的:

相互矛盾的思想並不會試圖消滅對方,而是並行存在。它們經常凝結起來,就好像它們之間沒有矛盾一樣,或者彼此達成妥協,我們的意識思維永遠不會容忍這一點,但我們的行動卻經常承認這點 (Freud 1953: 755, 斜體部分為原作者添加)。

所以,從譯者的誤譯中可以發現,無意識動機可能會揭示出多重甚至相互矛盾的決定,這取決於譯文釋放的語言剩餘,取決於錯誤偶然產生的文本影響與文本間聯繫。這個錯誤或是一種欲望的彰顯,這種欲望不僅僅是要質疑,而且是要挑戰或抵制在原文中鋪陳的話語。譯者的願望最終危及原文作者的社會權威和文化聲望,我們也可以更寬泛地說,譯者這樣是為了獲得作者對譯本的認可。

## 五、譯者、「父之名(Name-of-the-Father)」與母語

如果我們最終引入作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核心的「俄狄浦斯三角」,並根據拉康基於語言學理論對這一關係的反思,我們便可在該概念上更進一步。拉康認為,「我們必須從父之名中認識到象徵(對主體)的維繫作用,自歷史開端,這種象徵功能就將「律法」與「父親」聯繫在了一起」(Lacan 1977: 67)。拉康「父之名」術語的所指並非真實的人,即主體的生父,而是父親(這一角色)在構成主體能指鏈中所承擔的象徵功能。「父之名」代表了「律法」的各種形式,包括承載著社會權威或文化聲望的法律、制度、價值觀和信仰。最初,它是古代禁止亂倫的婚姻規定。

在拉康借助語言學理論對俄狄浦斯情結進行修正的過程中,「父之名」被當成一個能指,最終取代了「母



親的欲望」。當主體對愛的需求脫離了單純的身體需要並被體驗為匱乏時,這種欲望就出现在了主體中。此外,正如拉康所言,「如果母親的欲望是陰莖,」只要母親欲望父親,「孩子就希望成為陰莖,以滿足母親的欲望」(同上:289)。在拉康的思想中,陰莖並非身體器官,而是一個能指,它標誌著主體進入象徵界的性差異。「父之名」幹預了孩子的心理發展,將對母親的亂倫欲望轉化為社會可接受的形式,在語言中為主體構建了一個性別身份(拉康的理論是否適用於女性仍不清楚,也有爭議:Easthope 1999b 對此作了精闢討論)。對男孩來說,父親的幹預實際上是一種「閹割威脅」,驅使他將成為陰莖的欲望錨定在其他對象上。

談到翻譯時,我們可以注意到譯者處於兩個能指之間:(1)以原作者和原文形式出現的「父之名」,相對於譯者作品的次級地位而言,不僅代表了原創者和原創作品,而且可能已經積累了重要的社會權威和文化聲望;(2)母語和用母語創作的譯文,這種語言不僅是譯者最熟悉的,也是譯者對最初教授其母語的母親性欲認同所決定的。這種語言不僅是譯者語言能力和文化知識的主要來源,而且也是目前在翻譯文化中盛行的翻譯理論和實踐的來源(關於母語的臨床證據,見 Amati Mehler 等 1990: 90-105)。原文作者和文本象徵性地制定了一條翻譯法則,要求譯者對文本的語言和話語結構表現出足夠的尊重,從而模仿和傳播文本。母語則引導譯者使用熟悉和他能勝任的語言,且這種語言在過去滿足了譯者對交際效果的需求,尤其是在翻譯中,並受接受語境中翻譯規範的制約。原文作者和原文所代表的「父之名」對翻譯進行幹預,以防止譯者在翻譯中過多使用母語篡改原文,以至於在譯語和譯入語文化中造成太多扭曲。在塞爾日·加夫隆斯基(Serge Gavronsky)對翻譯過程的精神分析反思中,譯者「被迫(嚴格來說)限制自己,以尊重亂倫禁令。篡改文本就等於部分或全部剝奪了父親,即作者的主導地位」(Gavronsky 1977: 55)。

然而,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可能會通過釋放無意識的語言剩餘來揭示被壓抑的欲望,從而挑戰原作者。這種欲望可能是為了在翻譯中佔據權威地位,模仿作為原創者的作者地位,將作者視為經典人物,並通過譯文含蓄質疑這種地位。巴斯譯德裏達哲論,沃爾什譯聶魯達詩歌,以及我翻譯的布紮蒂故事都包含了語言錯位和偏差,譯者通過修改文本來抵制原作者的文化聲望,從而滿足譯者無意識的欲望——即接受可譯性理論,推進保守的政治意識形態,否定對幻想的精神分析詮釋。不論什麼情況,譯者所作的修訂都表明了一種更基本、更迫切的願望,即充當原作者對原文進行修改。

這類翻譯顯然涉及到意義的增益,這些增益不僅超出了詞彙學上的對等,而且與原文所表達的意義也背道而馳。然而,翻譯不可避免地會造成原文形式和意義的損失,這裏也可能存在無意識的動機。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揭示無意識運作的言語失誤可能包括關鍵字或短語的遺漏。而他的例子,恰好是一份法律檔的翻譯:

在 1867 年奧地利和匈牙利之間達成的「妥協」中,即關於雙方財政義務的法律章節中,「實際」一詞沒有出現在匈牙利語譯文中;(精神分析師)達特納認為,匈牙利議會起草人無意識地希望給予奧地利盡可能少的好處是遺漏的一大因素(Freud 1960: 128)。

弗洛伊德的論述表明,這一省略揭示的無意識欲望既是集體的,也可能是民族主義的,還顯然是政治性的。翻譯中的遺漏也可能指向其他更為個體性的動機,可能也與譯者、譯文較之於原文作者和原文的地位有關。

以威廉·韋弗 1968 年翻譯出版的伊塔洛·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短篇小說集《宇宙奇趣》

(*Cosmicomics*) 為例。卡爾維諾在這裏的敘事策略是賦予科學思想以擬人化的形式,用科學來探索人類經歷並將其陌生化。其中,名為「*Lo zio acquatico*」(*The Aquatic Uncle*, 水棲叔叔)的故事則基於進化論展開。兩只生活在陸地上的爬行動物——童男童女——相遇並墜入愛河,但當女孩被男孩的叔叔吸引時,雙方的關係則陷入僵局。正如標題所示,男孩的叔叔尚未進化到可以離開水生環境。最後,爬行動物男孩對周圍發生的生物變化進行了反思:

Every now and then, among the many forms of living beings, I encountered one who “was somebody” more than I was: one who announced the future, the duck-billed platypus who nurses its young, just hatched from the egg; or I might encounter another who bore witness to a past beyond all return, a dinosaur who had survived into the beginning of the Cenozoic... (Calvino 1968: 81–82)

時不時地,在形形色色的生物中,我會遇到一個比我更「重要」的生物:比如一只預見未來的鴨嘴獸,它正在哺育剛從蛋中孵化出來的幼崽;或者我可能會遇到另一只見證了過去的生物,它是一只存活到新生代初期的恐龍。

韋弗的英譯緊扣義大利文本,甚至沿用了義大利語法,變化很小。即便如此,也存在一個重大遺漏,短語「*gira sauna allampanata in mezzo alla vegetazione ancora bassa*」,按字面翻譯,可能是:「長頸鹿在仍然低矮的叢中憔悴生長。」這個短語指的是法國生物學家讓·巴普蒂斯特·拉馬克(Jean-Baptiste Lamarck, 1744–1829)的進化理論,他的論文《動物哲學》(*Philosophie zoologique*, 1809)認為,生物體的結構特徵是為了應對環境而生成的。根據拉馬克的說法,長頸鹿脖子變長是因為需要在非洲缺草的地區吃樹葉。拉馬克最終被達爾文(Darwin)的自然選擇理論所否定,而達爾文的理論正是卡爾維諾故事的基礎。在最後一段中,卡爾維諾的典故卻體現了他的諷刺幽默:在這裏,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拉馬克式的長頸鹿長得比植物還高。

我們如何解釋韋弗省略了這個短語?首先,要注意到,這種省略肯定是無意識的。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韋弗不僅是一位經驗豐富的義大利語翻譯家,且他的翻譯也非常出色,作品深受美國和英國出版商的青睞,並受到讀者的好評。事實上,他翻譯的《宇宙奇趣》在1968年獲得了美國國家圖書獎的翻譯獎。在一次電話交談中(2001年3月13日),韋弗本人將這一疏忽描述為無意識的,他向我稱,「這只是個疏忽」,他也說不清楚。

他還提供了一些補充資料,說明當時的翻譯背景。他說,儘管卡爾維諾的作品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被翻譯成了英文,但《宇宙奇趣》是他自己翻譯的第一部義大利作家的作品。韋弗說,有趣的是,卡爾維諾在拒絕了另一名英語譯者後選擇了他,因為卡爾維諾覺得那位譯者無法勝任這項任務。在注意到省略的部分「太多了,我自己無法完成」後,韋弗提到卡爾維諾有時會在將以前出版的義大利文本進行修改,然後再翻譯成英語。但是韋弗沒有辦法判斷這個遺漏是否出自卡爾維諾本人對作品的改動,他也不記得了。這一點似乎很重要,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痛苦的記憶特別容易屈服於動機性遺忘」(Freud 1960: 147)。事實上,考慮到卡爾維諾作品中如此多的幽默特徵,作者對作品的修改似乎不太可能。所以,他可能想在這裏保留它們。沒有任何一個義大利語《宇宙奇趣》對有關段落進行了改動。

除了這些細節之外,韋弗譯卡爾維諾作品時非常自信。其譯本特點在於,俚語辭彙和句法雖有些自由,但大體保持了詞彙學意義上的等同。常見的義大利語表達——「*vedr à che ci si trovava bene*」(You'll see

how well You'll get along,你會看到你們相處得有多好),「Mica storie」([It is] not a lie,這不是謊言),「Se ci stai stella」(If you stay with us, beautiful,如果你和我們在一起,就很好)——被豐富多彩的英語口語所取代,即「You'll be nice and snug(你會很舒適的)」,「I'm not fooling(我沒開玩笑)」,「If You're game, sweetie(如果你願意,親愛的)」(Calvino 1965: 74, 77, 81; 1968: 74, 77, 79)。韋弗的翻譯自始至終都彰顯了他精於英語的不同語域與風格。像「Mi precipitai a ricon-quistarla」這樣的短語,可簡單譯為「I hurried to win her back(我急忙把她追回來)」,但韋弗用了一種更具文學性的口才:「hastened to woo her back(我匆忙向她示愛)」(Calvino 1965: 81; 1968: 80)。根據英語對精確性和銜接性的獨特偏好,譯文比義大利文本更明確。例如,短語「all' asciutto」被譯為「on the dryness(在乾燥的土地上)」,短語「i nostri vecchi」被譯為「our elderly(我們的祖先)」,動詞「viene?」,即英語的「Will you come?」,但他將其譯為「Won't you come home with us?(你不和我們一起回家嗎)」(Calvino 1965: 71, 72, 74; 1968: 71, 72, 74)。韋弗的翻譯表現出如此巨大的控制力,如此流暢和富有表現力,以至於顯化了遺漏,而且我們很難將其單純歸納為譯者的疏忽。

我想說的是,這種省略是譯者無意識地想要與外國作家競爭的表現。當時翻譯的環境——特別是《宇宙奇趣》是韋弗首次翻譯的卡爾維諾備受讚譽的作品;這位義大利作家在拒絕另一個譯者後選擇了這位譯者;以及譯者在如此自信的姿態下執行該專案,這都表明譯者在尋求卡爾維諾對他的作品認可。在這樣做的同時,他也在模仿卡爾維諾的作者身份。在精確性和明確性方面,英語譯本甚至超越了義大利原文的語言和文體特徵。具體而言,譯文的省略帶有一種微妙的挑釁:通過刪除義大利作家諷刺幽默風格中的一個典故短語,韋弗下意識地挑戰了卡爾維諾的作家身份,以及他的作品當時在意大利和其他地方已獲得的文化聲望。就長頸鹿細長的脖子構成的一個陰莖形象而言,這一省略可被視作父親作者的象徵性閹割,而更為流暢的母語則彌補了這一省略。為了提高英語的連貫性和可讀性,韋弗插入了義大利原文中沒有的短語「I might encounter(我可能會遇到)」,並重複了先前的短語「I encountered(我遇到了)」。

## 六、結論

翻譯中的「相似性」概念可以理解為兩種不同的關係:第一種是源文本與譯文之間的相似性,第二種是譯文與接受語境中的其他價值觀和實踐之間的相似性。這兩種關係不僅是對立的,而且經常相互影響。然而,它們共同指導著每一項翻譯實踐。它們都不是先於翻譯過程而存在;而是通過翻譯建構而成。原文和譯文之間的相似性是當今最常見的,它是一種詞彙學上的對等;它總是建立在不可還原的差異、語言之間的結構性差異與話語差異、文化間價值觀以及意識形態差異的基礎上。譯文和接受語境間的相似性總是建立在同樣不可還原的差異基礎上,即原文和譯文在形式和主題上的差異,以及與原文在原文文化中構成的文本內和文本間的不同關聯網路。在翻譯中,差異總是先於相似。正是差異促使人們對相似性進行還原性的探索,甚至希望通過這種自相矛盾的方式來傳達原初的差異。

造成翻譯中不可還原的差異的原因之一是譯者的無意識。首先必須將無意識與前意識區分開來,前意識指的是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已經學到但沒有意識到的東西。前意識包括譯者對源語言和譯語的瞭解,也包括 Gideon Toury (1995) 所說的影響翻譯過程的文化和社會規範,特別是當前在接收語言環境中盛行的翻譯傳統、慣例和實踐。雖然這些知識體系在翻譯中是自動起作用的,但如果譯者從翻譯過程或翻譯產品中抽



身出來,以批判的超然態度審視其中任何一個知識體系,這些知識體系就能夠被有意識地表達出來。然而,從定義上講,無意識仍然超出了譯者的認知範圍,只有另一名研究者——或者可能是在稍後的時刻和另一個分析情境中,譯者才能感受到它。

譯者的無意識不可避免地會將差異引入翻譯,因為它出現在譯語和文化中,與原文作者和原文有關,這種關係很可能是對立的。無意識,尤其是在像翻譯這樣的寫作實踐中,從根本上來說是語言和文本的。正如德里達所說,它們「業已處在一種對純粹痕跡和差異的編織中,其中意義和力量實現了統一。一個不存在的文本,總由已經轉錄的檔案組成」(Derrida 1978: 211)。譯者的無意識是「無處存在」的,因為它產生於翻譯過程中。

藉由譯文中的語言剩餘,以及譯者為了翻譯原文而創造的語篇效應和互文聯系,無意識方可顯露。

譯本中的有些影響與關聯實際上或是譯者有意為之;而其他的影響和聯繫則超出了經驗豐富的譯者的有意識意圖,表現為誤解或誤讀,是一種無意識動機、壓抑的焦慮和不滿足的欲望的表現。這些誤譯可能是由原文的形式和主題特徵以及發生誤譯的特定段落引起的。它們也可能由誤譯發生的直接背景之外,但仍與錯誤有關的要素觸發,即翻譯背後的更大的文化和社會環境。在這種情況下,症候性錯誤可能揭示了譯者的政治無意識,即在翻譯的想像層面解決社會衝突中被壓抑的欲望。這些誤譯是症候性的,並非認知性的,也不僅是錯誤或疏忽。因為這些錯誤均出自經驗豐富的譯者之手。若將這些誤譯置於詳盡的語境中,它們便會揭示出跨個人因素的無意識運作(見 Timpanaro 1976,雖然我不同意他的觀點)。以上因素確保了無意識總是與譯者試圖建立的「相似性」背道而馳,並阻止翻譯落入一種簡單的交流行為。

儘管如此,在沒有更多案例的情況下,我對譯者無意識的研究還只能是臨時性的。雖說只能籠統闡述,有關譯者無意識,尚有一些重大問題亟待考察。我列出的案例均涉及男性譯者,出於這種性別局限,特別考慮到女性主義對精神分析的影響(見 Mitchell 1975 和 Mitchell and Rose 1982),我想提出另一個問題:原文作者或譯者的性別身份是否對可能出現的症候性文本的特徵和意義產生影響。一位權威的女作家的原文會在男性譯者的文本中展現出特定的誤譯嗎?鑒於幾個世紀以來對男性作者身份的表述(見 Chamberlain 1988),女性譯者在翻譯男作家時會在無意識中對作者身份提出挑戰嗎?臨床證據表明,對母性特徵的力比多投注(libidinal investment)和「主體—母語」的關係存在聯繫。這便對譯者的母語使用提出了質疑。力比多投注的深度是否暗示了譯者嘗試母語的傾向?這種投注對譯者將母語翻譯成其第二語言有影響嗎?問題種種,均待解決。我以這種簡便的方式陳述它們,只是為了表明精神分析介入的翻譯研究的有效性以及啟發性。

最後談一下翻譯研究的方法。為挖掘譯者無意識,翻譯學者顯然需為翻譯過程或產品帶來一套來自精神分析傳統的理論假設。若無此假設,譯者無意識便不會顯現,也無法被分析。我們研究最富成就的譯者所犯的誤譯,其意義也不會超出誤譯文本的範疇。此外,如果翻譯研究者不接受精神分析的諸多假設,那麼再多的經驗證據也不可能讓他們承認源於這些假設的論點。當然,精神分析也解釋了拒絕接受關鍵假設的緣由,比如無意識的存在與其工作機制:對分析的抗拒亦是一種壓抑。可以思考,這種壓抑在學術話語中到底隱匿了什麼,它服務的對象究竟是個人還是機構?也許精神分析傳統最值得翻譯研究借鑒的地方是,它可以幫助譯者、翻譯研究以及實踐避免受制於這些隱匿的動機。